

民意快船应该绕过公民隐私

别拿“房婶”的隐私不当事 11月23日 新京报 李慧翔

近日,广州市纪委官方微博“廉洁广州”对网传“房婶坐拥24套房产”一事作出微回应:广州城建退休职工李芸卿,系原广州城建开发有限公司属下设计院退休高级工程师,未曾担任该单位行政职务,也非中共党员。网上登载其家庭的24套房产情况基本属实,部分房产与其儿子共同所有。

新京报一评

11月7日,李芸卿的“家庭房产情况一览表”被曝光,帖子迅速被转载到了微博和各大网站,媒体也迅速跟进。

但经过纪委调查和媒体走访发现,李芸卿并非什么领导,只是一个退休的高级工程师,既不是领导也并非党员,1997年就退休了,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“平民一个”。

虽然民众对“房婶”的关注是对当下反腐关注的另一种表现形式,但当“房婶”的身份澄清后,另一个问题随之浮出水面:与民众申请官员财产公开的正当性不同,如果普通市民的财产来源合法,其个人信息被泄露是否理所应当?这不能不让人质疑,李芸卿的个人房产信息,究竟是如何被曝光的?

广州市房地产档案馆出具《家庭房产情况一览表》,是有严格要求

的:申请人须是向银行申请住房贷款的借款人,不仅要有所有家庭成员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,还要有贷款银行、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具的载明查询事由的介绍信。既然这个表是申请住房贷款用的,那么自然还要转交给相关单位,在他人几乎无法做伪申请的前提下,最合理的怀疑便是广州市房屋管理局或贷款银行、公积金管理中心等单位将李芸卿的信息透露了出来。

房产信息毫无疑问属于普通民众个人隐私,假如相关部门通过调查未发现李芸卿有什么不轨之处,那么“房婶”就将成为“网络反腐”或“网络人肉”的误伤者。到时,焦点将迅速转变为“李芸卿的个人隐私是如何泄露的”,相关单位恐怕必须正面回答这个问题。

别拿“房婶”的隐私不当回事,因为这已触及个人信息安全的底线。

现代快报再评

“表叔”、“房叔”之后,民意的快船在网络海洋里呼啸,最近的成功案例是重庆的“雷公”。

可以说,从网络反腐到网络问政,公共舆论起到了推动中国社会奋力向前的正面作用。但不可否认,也会出现误伤,曝光“房婶”就是一起典型的失败案例。

问题就出在如何把握公众知情权与公民隐私权的平衡。舆论监督,满足公众的知情权,但公民也有隐私权,哪些可以曝光,哪些应该“三思”而后转发或求证,民意的快船如何绕过公民的隐私,都值得媒体和网民用心思考。这一事件最该彻查的是信息源,普通公民的家庭房产信息掌握在相关部门、单位手上,目前为止,广州市房屋管理局、贷款银行、公积金管理中心都是合理怀疑的对象,它们需要自证清白。

在命面前“娱乐”何其刻薄

浙江丽水云和县的梅某是武术爱好者,他曾任市云和武术协会会长,在武术比赛中勇夺三金一银,还在国际武术大赛中获得七项全能冠军,擅长“板凳功”和“洪拳”。但不幸的是,前几天,与邻居的一次争斗中,他被砍身亡。

(11月20日《钱江晚报》)

缺少“人味”的幽默 11月21日 长江日报 水易寒

长江日报一评

大清早就看到微博上热评《武功再高,也怕菜刀》,初看我还以为是哪位武林高手与人比试手夺刀失败了,点开才发现是一起命案。真不知道这则标题是被以何种心态做了出来,这需要多么坚硬的心肠啊!

同时,很多网友也是带着强大的娱乐精神来读这条新闻的,各种诙谐调侃。“呵呵,典型的中国功夫神话。”“这是要笑死我吗?武功再高,也怕菜刀。功夫再好,一砖撂倒!”“一定是对手没按套路出牌,点到为止都不懂?”

网友的评论中尽显了贫嘴的风头,唯独难见到有人情味的关怀。是不是我们每天见惯了听惯了各种伤亡惨剧,心态实在是过于麻木,“死得没有特色”,便难以引起我们的注意,“死的人数不多”,就难以博取我们的同情心。如今,武术大赛冠军被邻居用菜刀砍死,这种“带喜感的死法”,多么难得,怎不令人捧腹?

真不知死者的亲属看到网友这些调侃是何种心情,这等于给正在悲痛中的他们,伤口上再撒上一把粗盐。

记得有人说过,“中国人只关心其直系亲属的命运,只有直系亲属的死亡才能令其真正悲伤”。这话不对,贵州毕节五位流浪儿童“闷死”在垃圾箱里,引起广泛关注与深切同情。可这话有时也不完全错,至少对部分人有效,否则何以面对他人生命的离去,那是记不起给点同情和关怀呢?

现代快报再评

这是一起事关生命的严重刑事案件,是一个让人扼腕叹息的沉痛悲剧,可是,因当地媒体在报道时刻意强调其“武术爱好者”的身份,增添了抓人眼球的“冲突元素”,不可避免地把报道引向娱乐化。也许不是有意为之,不过,带有鲜明倾向的主观议程设计,看似提升了报道的纵深度,吸引了读者的眼球,却使报道的事实判断走入了歧途。

后来有媒体继续跟进,说砍死梅某的叶某同样也是一个常练习洪拳、散打的武林高手,仍然没能走出娱乐化的思维。

这样的议程设置,无论有多用心、多“正确”,如果缺少了同情心和同理心,缺少了基本的人性关怀,就显得何其刻薄。面对悲剧,尤其是人命悲剧,媒体应有适当的敬畏和悲悯。

“不作为”的背后是“乱作为”

准生证不该折腾人 11月23日 人民日报 姜赞

人民日报一评

准生证难办,主要发生在流动人口身上。人口是流动的,但管理的步伐却没能跟上。“人户分离”之下,居住地并不掌握流动人口的生育状况,户籍地也无法跟踪流动人口情况,导致人们不得不在不同省市间来回奔波,加大了办理难度。

再者,各地准生政策不统一,材料要求、手续流程五花八门,有时还相互“打架”,给办证人设置了一个又一个“行政梗阻”。

繁复的程序关卡,已经让人心生“蜀道难”之虑,然而,现实中一些办理人员不主动、不负责、不作为的作风,“打官腔、甩冷脸、踢皮球”的态度,“公文旅行”的低下效率,又增加了办理的复杂程度和失败可能。

制度的障碍、人为的阻碍,让准生证成了不少人望而生畏的“折腾证”。类似现象在商贸投资、社会事业等领域也多多少少地存在。老百姓办事难、办证难的背后,凸显了深化行政体制改革、创新社会管理等时代课题。尽管“准生证”制度存废还有待深入研究论证,但统一各地准生政策、简化办事手续、创新审批模式、提升办事机关工作效率,引入一站式服务、网上申报等办理方式,乃至制定符合流动人口实际的户籍和计生管理政策,现在不仅能够做到,而且在流动人口办证难的呼声高涨之下,还应当又好又快地实现。

现代快报再评

为办准生证奔波两地长达三年无果,说来让人哭笑不得。为何不能

通过信息化管理来简化流程?说到底,就是以折腾百姓的“乱作为”、“瞎作为”来掩盖“不作为”,以臃肿的机构设置来掩饰人浮于事的机关作风。办张证要盖章签字40多个,看起来很忙、很辛苦,还“累断腰”,以为可以通过盖章部门的循环认证堵住漏洞,实际上起不到任何作用,想超生的不需要证明,想走后门的一个电话就可搞定,折腾的只是那些没门路的本分人。

社会上出现取消准生证的呼声,不是完全没有道理。一是符合中央简化审批程序、提高行政效率的要求,二是一些地方政府的创新实践和探索提供了经验。目前广东、内蒙古等地,就已经取消了“准生证”,采用的是登记备案制。数年的实践证明,效果比准生证要好。

权威部门更有责任说清贫富差距

媒体要传递正确的“贫富差距观” 11月23日 中国青年报 曹林

中国青年报一评

在民调数字面前,面对受访者“被焦虑”的困惑,媒体需要反思那种不负责任的报道给公众情绪带来的不良影响。再严谨的调查,也许都无法完全捕捉最准确的“民意”,但调查的结果,却提出了一个媒体无法假装看不见的问题:如何报道贫富差距问题。

不得不说的是,不少媒体在报道中国贫富差距拉大问题时,传递了一种错误的“贫富差距观”。错误的价值观之下,必然只会加剧焦虑,而对解决问题毫无帮助。错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:

首先,贫富差距并不总是坏的,相反很多时候是一个好事,拥有一定限度的贫富差距,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。但有些媒体不加区分地看待贫富差距,通过报道和评论传递一种错误的观点:贫富差距都是坏的,必须全盘否定。这种错误的观点,在舆论中制造了价值观的混乱,向民众传递了不切实际的期待。中国社会的进步史,就是一个打破“专断下的平均主义”而引入市场竞争的过程,中国30多年改革的活力,中

国的发展,都是“允许差距”带来的红利。当然,市场不是至高的价值,贫富差距应该控制在一定的限度。不过,媒体在谈论贫富差距时,不能为了迎合某种潜在的、根深蒂固的、民粹的“均贫富”思想而将贫富差距妖魔化为洪水猛兽,或者只为了吸引眼球而这样做,仿佛所有的差距都不能容忍,财富成为一种罪恶,贫穷都是因为受迫害。这一方面会误导公众,使很多人将“富”当作一个敌人,将“穷”当成一种道德优势,制造了一种指向财富的敌意,让富人无安全感,无恒产者无恒心。

然后,谈论贫富差距问题时,要有所区分,分析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差距?不能以先入为主的偏见看待富人,也不能认为站在你对面的穷人就是天然的弱者,就是受害者。如果一个人不好好读书,不努力工作,懒惰成性,养不活自己,这样的贫穷不应该被理解。需要批判那些因为权力的垄断和权贵的勾结而导致的差距,“仇视”那些并非靠努力而是靠掠夺获得的财富,而不能笼统地谈贫富差距。这种不加区分的笼统会误伤那些勤劳致富的人,也会为懒汉找到一种借口。

最后,媒体应该致力于以舆论监督去打通穷人向上流动的通道,监督萝卜招聘之类破坏公平的丑事,而不是仅仅停留于对贫富差距空泛的抱怨。

现代快报再评

媒体有责任报道真实的贫富差距,权威部门也应发布准确的信息。一些媒体“随便在网上搜索骇人听闻的野鸡数据”,“野鸡”横行,是因为“家鸡”阙如。去年年末,国家统计局发布《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统计监测报告(2011)》,对于基尼系数只是使用了“略高”这样的一个模糊形容词,公众这才意识到,自从2000年公布中国基尼系数为0.412之后,国家统计局再也没有对这项统计公布过具体数字。

当然,“家鸡”不打鸣,并不意味着媒体就无所作为。

走进贫困山区,看看山里孩子吃什么、住什么,看看他们的家园和校舍;走进西部地区,看看偏远地区民众的真实生存状态。媒体关注贫富差距,决不是吁求“均贫富”,而应该是呼唤制度上的起点公平和机会公平。